

周秦中国社会思想早熟的成因探析

桂 胜 刘益梅

[摘 要] 周秦是中国社会思想的滥觞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与当时的“士”的自觉分不开的。本文主要循着知识社会学的理路,从知识、思想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士人的价值取向、文化自觉等内在原因和经济、政治、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外在条件方面对周秦社会思想早熟的原因作些探析。

[关键词] 周秦;社会思想;早熟;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1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8)02-0282-05

中国社会思想有悠久的历史,周秦是其发展的滥觞时期。从西周“礼乐文化”的兴盛,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数百年间涌现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不仅有孔、墨显学等诸子学说甚至还包含有名不见经传的一般言论。这些社会思想闪耀着几千年的历史光辉,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周秦社会思想表现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早熟。

一、关于周秦社会思想早熟的特征分析

关于早熟,前人曾有过论述。《孟子·告子上》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莠稗。”孟子以庄稼的成熟来比喻道德习惯形成的意义,强调了成熟的重要性。周秦社会思想的出现虽然很早,但是它早而不生,思想深邃,影响深远。所谓“早而不生”,也就是早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秦社会思想具有系统性。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对社会的看法时,从个体上看,具有独自的特色和丰富的理论建构;而从整体上看,又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第二,周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因袭多而创新少而言的。周秦时期的思想家对天、地、人及社会问题的思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第三,周秦社会思想具有范式意义。周秦诸子的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为后人所效仿。第四,周秦社会思想具有普示性。这种普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过去,对过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积累,对今人甚至对于未来同样具有启迪作用;一是从空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第2页)。第五,周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释性。周秦社会思想家关于人性与社会理想的模式,关于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关于人和社会的关系,关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十分精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具有普释意义。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很多,但是大抵还是围绕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范畴进行讨论,而这些范畴早在周秦时期就为中国的思想家们所普遍关注。第六,周秦社会思想具有超越性。“周秦时期,思想同权力和技术的分离,致使思想可以脱离实用,可以超越制度和技术的支持与羁绊,自己酝酿多彩的内容”^[2](第81页),从而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超越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可以

天马行空,由于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他们的思想无疑具有经世致用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有所说明。第七,周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性。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这种超前也可以通过“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1](第7页)(囿于篇幅,仅谈及早熟的概括表现,中国社会思想早熟的具体表现另作专论。)

思想是建立在社会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管理、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卡尔·曼海姆曾说: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才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3](第10-11页)。就中国而言,社会思想之所以在周秦呈现出早熟状态,归根结底还应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周秦社会思想早熟的内在原因分析

有人把社会科学理解为人类理智对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与独立自觉的认识,那么,通过对周秦时期士人的研究,我们感到这种理解十分中肯。周秦士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在周秦社会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上自始至终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内在原因之一——周秦自由阶层“士”的出现

周秦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士”阶层。在殷周奴隶主社会,“士”是贵族等级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深通“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熟悉古代典籍,能文善武,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分别演化为“文士”和“武士”^[4](第29页)。平时他们论道明理,修身养性,当国家有难时,他们则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披坚执锐。他们中不乏既有抱负又有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经济之才。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士”阶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被降为四民之首。他们持“道”与“势”相抗,与王侯之间既是君臣关系也是师友关系,其行为和思想比较自由,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知识的主体阶层。

(二)内在原因之二——周秦士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主体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尽管周秦士人是个相对自由的阶层,但他们仍然隶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特定的时代,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总是会受一定价值取向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周秦士人无论是儒家、法家、墨家还是道家,他们都追求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希望人民能过上稳定的生活,体现了博大的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

孔子强调“士志于道”,“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道”是他们理性选择的价值标准。《论语·里仁》中,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荀子·正名》“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道”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人们应该依道而为,同时坚持“天人合一与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取向,他们宣扬“仁”、“礼”,其思想虽有等级色彩,但也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理性。他们认为“人为天下贵”(《荀子·王制》),人应该是天人关系的中心。在义利关系上,主张义高于利,义应该制约利,利应该在义的指导下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利益。孟子强调物质利益需求应该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社会利益高于个人私利,要求人们“去利怀义”、“以义为利”,反对为个人私利而危害社会整体利益。同时要求“士”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表现出对整个社会的深深关爱。墨子既讲“天志”又讲“非命”,墨家的“天志”实际上是墨家意志——“兼相爱”、“交相利”的一种反映。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天人观,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一种客观存在,人的认识能力只是人类天然的一种属性。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强弱,并非取决于天命,而在于君主是否能正确地运用法、术、势有效地进行统治,要求人们“乘于天明以视”(《韩非子·解老》)老子崇尚自然,要求人们效法自然、公平贵和、不争不战、谦下、返朴归真。强调“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周秦士人能够以独立的人格活动于社会舞台,拓展他们思想的发展空间,自由地鼓吹自己的观点。

(三)内在原因之三——周秦士人的文化自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

文化自觉更多的是源于内在人性的理性自觉,源于认识主体对自己行为的自主选择,它既是自觉的,又是自愿的。周秦士人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中曾参进一步阐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墨子直言不讳:“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上》)。孟子大言不惭:“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周秦士人的文化自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社会义务感,他们积极地思考社会问题,立德、立言、立功,“美国家,利百姓,功施当时,泽及后世”(《温国文正公司马公集》)。

周秦士人的文化自觉还表现在他们对社会现实充满了焦虑和深深的关注。针对社会失序、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等社会关系严重失调的社会现实,周秦士人作出了理性的思考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企图使无序的社会纳入一个理想的轨道和新的秩序之中。如老子的“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无为”而治思想,孔子的“德化仁育礼治”的思想、墨子的“兼爱”、“尚贤”思想,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为民制产”的民本思想、荀子的“化性起伪”、“师法教化”思想以及韩非的“服之以法”的社会控制思想等等都是周秦士人为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提出的治国方略,闪耀着时代的光辉。

三、周秦社会思想早熟的外在原因分析

(一)经济的发展为周秦社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周时期井田制的废除、赋税制度的改革以及获取实物地租利益的驱使,促使统治阶级采取各种办法来扩大耕地以增加收获量,其结果是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促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周秦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了阶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变化,社会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出现了劳心者阶层。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某一部分人无须为生计担忧,可以致力于社会问题的思考,针砭时弊。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封建地主经济的崛起。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新兴的封建势力在政治上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因此,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思想纷纷出现。如在春秋末期,一些哲人已经认识到社会的稳定或动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上天,而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只能从社会本身的状况中去寻找。

(二)失范的社会秩序和激烈的社会变革为周秦社会思想的早熟提供了机遇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指出,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人类正是在努力应对自然环境与人为的挑战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文明。挑战越大,回应也愈活跃。

周秦时期,社会处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转型期,旧的规范已经丧失了对人们的约束作用,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因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

周秦时期失范的社会秩序促使人们在思索与探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案,造就了丰富而又早熟的社会思想。各种类型的思想相互交汇、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等一批思想家。他们高举道义的旗帜,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对社会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开出了各自的救世良方。尼斯贝(Robert Nisbet)说:“特别是政治和社会思想,我们尤其需要经常看到,每个时代的思想,是对危机及社会秩序的巨大变迁所造成的挑战的回应。”^[5](第33页)虽然各学派的思路各不相同,但是在唤醒社会良知、恢复社会安定、重建理想家园方面却有着共同性。

(三)旧有的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崩溃萌生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牧野之战，周打败了强大的商朝，人们对天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原来的天神观念被打破了。随着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激化，固有的统治秩序日趋混乱，于是一向神圣的“昊天”、“上帝”也越来越受到怀疑甚至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和诅咒。“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荡》）；“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小雅·雨无正》）；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激起了臣民的强烈愤慨：“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大雅·柔桑》）理性的思考使得人们从宗法伦理和天命神权观念束缚下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开始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从而“在过去那种不证自明的思想体系上划出了一道道裂痕。”^[1]（第84页）旧有的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崩溃了。

“一般说来，怀疑主义产生于以群体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崩溃。对于一个世界观的确信有赖于其支持者的安全感，当个体在群体中的立足点开始变得不安全或这一群体的团结开始瓦解时，个体就开始怀疑该群体的既定的信念。”^[7]（第213页）周秦时期，萌生了一些对后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文主义思想。如叔孙豹的“三不朽”观念，周公的敬天、明德、保民的主张，《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天行有常”、“明天人之分”及“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等等。

(四)多元化的政治局面和“私学”的兴起为各种社会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宽松的学术氛围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国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即：既没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从而形成了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各家各派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残酷的剥削和激烈的战争撕开了温情脉脉的“礼”、“德”的面纱^[7]（第12页）。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转向下层，史官流落各地。一些文化官吏和百工，带着原来秘藏于宫廷的典籍、礼器、乐器逃亡到四面八方，从而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这是乐师流亡四方、礼崩乐坏的真实写照。“官学衰微，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殷周时期的教育体系全面崩溃导致私学兴起，到战国时期，私学达到鼎盛。诸子百家各成一说的局面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黄金时代。周秦时期天人关系的变化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正是周秦时期社会开放的思想反映和理论概括。

(五)诸侯争霸和富国强兵的需要为各种社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周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强大，礼贤下士，希望借用士人为他们出谋划策，以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各国君主纷纷打出了礼贤下士的招牌，对士人谦恭有礼。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以便推行其政治主张。顺应社会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养士多达数千人。统治阶级对士人优待有加，齐国陈恒“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养士。”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田文）。”著名的稷下学宫正是周秦养士之风盛行的最好例子。

(六)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周秦社会思想的早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也不断地发展起来。当时的天文、历法和算学等均有较高的科学成就。自然科学的发展，打破了迷信或偏见，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水平，促使人们开始科学地思考困惑自己的种种问题。尤其表现在“天人观”等方面。

(七)百家争鸣、思想间的互动为周秦社会思想的早熟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周秦诸子从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出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为了构建各自的理

论。他们或游说、鼓吹,或著述、授徒,或商榷、辩难。在互动中吸收,在争论中完善。诸子间的互动、争辩对于周秦社会思想的早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周秦时期早熟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8](第 14 页)。

[参 考 文 献]

- [1]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1 卷,载《七世纪前中国的思想、信仰与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3] [波兰] 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郑斌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88 年版。
- [4] 赵吉惠:《中国先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 [5] 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诠释》,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8 年版。
- [6] [德] 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7]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8] [德]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 [9]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 [10] 李家珉:《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特征及转型》,载《上海电力学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
- [11] 朱人求:《论儒家的文化自觉精神——以周秦儒家为对象的分析》,载《燕山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 [13] 王磊:《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责任编辑 于华东)

Analytical Study on Precocious Social Thought during Zhou and Qin Dynasty

Gui Sheng, Liu Yimei

(Depart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social thought derives from the era during Zhou and Qin Dynasties. The situation is closely relevant to the given social condition, especially inseparable from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i" at that time. The paper, with the aid of the theories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s of thought's emerging and existing. And from this, it analys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the precocity of social thought during Zhou and Qin Dynasties, such as valu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schola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natural science, etc.

Key words: Zhou and Qin dynasty; social thought; precocity; cause analysis